

# 清代浙东学派的传承衍化 及其学术地位

曾礼军

**内容提要** 清代浙东学派并不局限于清前期的浙东经史学派，从清初至清末都有传承和延续。其传承衍化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转型分化期（顺康之际）、繁荣兴盛期（康雍乾）、中衰重塑期（嘉道）、多元复兴期（咸同光宣）。前两期以黄宗羲及其弟子群为代表，复兴期则以定海黄氏家族、瑞安孙氏家族和德清俞樾及其弟子为典型。鼎盛与复兴之间历经中衰，学术传承看似中断，实则仍有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是通过乾嘉学术的嫁接而得到重塑，另一方面则是远绍宋元浙东学术而得到重生。由此，浙东学术特质也发生了转型，由经史义理转向通经训诂，并由陆王学统转向程朱学统。清代浙东学派对于宋明浙东学派传承、清代学术发展以及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学术贡献和地位。

**关键词** 清代 浙东学派 传承衍化 学术地位

作者曾礼军，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华 321004）

中国学术具有成熟而分明的“流别统系”是自南宋才开始形成的，而浙东学派即是其中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虽以浙东区域命名却又超越区域，并且学人辈出、成果丰硕、影响深远。浙东学派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者是指以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浙东事功派和以黄宗羲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史学派，广义者则指向自南宋至清代的学派贯通者。明清之际黄宗羲最早提出“浙东学派”一词，但内涵是着眼于浙东学术，清中叶章学诚进一步阐述和倡导浙东学术。近代以来，梁启超、何炳松、陈训慈等开始从学理上对浙东学派进行论述，为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东学派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吴光、董平、钱明、何俊、钱茂伟、王宇等学者从文献整理和理论阐述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内涵、学术特征和学术传承，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学界都未有明确的定论。

本文尝试从学脉、学统和学质等三方面来厘清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传承、学术内涵、学术特征和学术地位。所谓学脉是指学人之间的师承、家学和交游的承接关系，以前两者为主；所谓学统是指包括学术取向、学术体系和学术价值在内的学术传统；所谓学质则是指学术特征和学术成就。就横向的某个时段内，三者是统一的，即具有承接关系的学人之间的学统、学质大致相同或相似；而从纵向的历时性发展来看，三者则往往会错位，即具有承接关系的学人之间的学统、学质并不一定相同或相似。前者体现了学派的静态性，后者体现了学派的动态性。无静态性，学派无以形成个性特征；无动态性，学派无以传承发展。据此，清代浙东学派传承衍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转型分化期（顺康之际）、繁荣兴盛期（康雍乾）、中衰重塑期（嘉道）、多元复兴期（咸同光宣）。

## 一、转型分化：顺康之际的浙东学派

清初浙东学派是阳明王学人清后的主要传承者，主要包括敢山弟子和姚江书院弟子两大群体，前者学术成就突出且多有创新，后者学术成就不显且较为守旧。两者都主要活动在顺治朝和康熙初年。梁启超说：“明清擅代之际，王门下唯鼓山一派独盛”。因此，清初浙东学派主要是指蔽山学派。随着宗师刘宗周于顺治二年（1645 年）殉节死难，清初敢山学派也发生学术转型和分化。其中，张履祥、陈确和黄宗羲为鼎足而三的学术典型。张履祥由王返朱，逐渐偏离了师说；陈确重拾“良知”学说批判程朱理学，发展了师说；黄宗羲宗鼓山慎独之说，又以经史文献避虚应务，修正了师说，并由此充实和扩大了浙东学派新内涵，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的新局面。

张履祥是最早且最明显偏离师说的敢山弟子。张履祥“潜心理学之学，少嗜姚江，中师敢山，晚乃一归于洛闽”。曾于顺治元年（1644年）二月经祝渊绍介绍受业于刘宗周，五月归杨园。短暂三个月的受业生涯，对于张履祥来说，影响颇深。其曰：“吾自见刘先生后，自信益笃。”，回到杨园后，张履祥即编著《刘子粹言》。闻宗周绝食殉节后，痛哭祭奠。后又多次亲临祭拜或撰文纪念。但自顺治六年（1649年）起，张履祥始一意程、朱之学，进行尊朱辟王，偏离敢山学说。

顺治十一年（1654年），陈确著《大学辨》进一步加速了鼓山弟子分化和张履祥对敢山师说的偏离。《大学辨》本名为《大学非圣经辨》，文章始成，闻者惊骇，引起了敢山之子刘沟和吴蕃昌、沈的等其他弟子的辩诘，尤以张履祥批驳最突出。陈确先是以文献考辨方法，论证《大学》非先秦之书，指出此书非孔子、曾参所作之圣经，进而以阳明良知学说批驳程朱理学。对于陈确的惊世骇俗之论，张履祥在此后的三四年里，或书信，或面诘，进行过多次劝谕和批驳。其曰：“谓《大学》为非孔、曾亲笔之书，则固然已；谓《大学》为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学，则必不可。”，张履祥不但肯定了《大学》为圣贤之经，而且认为除程朱理学外，无能齐家治国者。

《大学辨》的论争揭示了刘宗周卒后敲山学派走向学术转型和分化的现实。“陈确趋向于陆王心学，却更进一步提出废置《大学》，以内在的良知作为日用体验的标准”，而“张履祥趋向于程朱理学，则认为必须依据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以外在天理作为日用体察的标准”。这不仅揭示了清初浙东学派的内在分化，而且也揭示了其应对明清易代社会现实的学术转型。面对阳明后学的空疏之风，张履祥主张由王学返回朱学，企望以程朱理学重新拯救社会；陈确虽然依然沿着陆王心学一路而下，却开始重视以文献考辨方法来解决义理问题，体现了学术方法上由义理辨析向文献考证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张履祥看似偏离了成山学说的主体方向，实际上却是“沿着刘宗周以朱学修正王学的方向继续发展，从而更趋近于朱学”。与张履祥一同转向程朱理学的敢山弟子尚有刘沟、吴蕃昌、沈的、叶敦灵、挥日初等人。

黄宗羲对《大学辨》有一个由批评到肯定的过程。康熙丙午年（1666年），黄宗羲为刘沟撰《刘伯绳墓志铭》曰：“子刘子没，宗旨复裂，海宁陈确乾初，以《大学》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经，言人人殊，因言《大学》非圣经也。自来学问，由正以人诚，未有由诚以人正者。孟子言求放心，夫子言志学从心，其主敬工夫从心始，不从意始。”（啧啧对陈确的批评是很明确的。陈确卒后，黄宗羲为其撰有《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先后有四稿。初稿撰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稿改于康熙三十一年（1693年）。初稿对陈确仍持否定态度，到了四稿虽然并不完全认同陈氏思想，但还是肯定了《大学辨》。其原因在于黄宗羲认为学术应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学术观念与其编纂《明儒学案》过程中形成的“一本万殊”论的学术史观密切相关。正是由于黄宗羲有“一本万殊”的学术史观，使得他的学术思想虽源于鼓山而能以经史文献廓大、充实甚至修正它。梨洲学术同样体现了明清学术转型，如果说杨园学术重在理论上由王返朱的转型，而陈确学术重在方法上由义理辨析转向文献考辨，那么梨洲学术则同时重视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转型，由单纯的理学研究转向经史并重，并以文献考辨来探讨义理思想。

与敢山学术转型分化密切关联的还有吕留良和陆陇其两位学者，他们虽不是敢山学人，但受到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了清初“尊朱辟王”的学术实效。吕留良先是与黄宗羲交好，康熙二年（1663年）和四年先后两次延请宗羲为馆师。康熙五年两人发生鲍齔后，吕留良则延请张履祥为馆师，自康熙八年（1669年）至十三年，张履祥一直馆于吕氏家中。张、吕两人与何商隐、张佩葱诸人，“共力发明宋学，以朱子为归”。陆陇其与张履祥没有直接交往，而是通过吕留良而间接受到影响。因此，陆陇其对杨园学术多关注。由于陆陇其为朝廷重臣，对“尊朱辟王”思想的推动产生了重要作用。康熙二十二年，陆陇其与理学名臣汤斌进行一场学术论争，分别代表朱学与王学，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康熙十三年（1673年），张履祥卒。此后，其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延续了他的学术主张，形成杨园学派。其及门弟子主要活动于顺康时期，私淑弟子则主要活动在乾嘉时期，杨园学脉直至晚清民初都有嗣响。但是，由于张履祥强调躬履践实，其及门和私淑弟子也都以践履修德为向导，重视个人道德修行，而在理论上除了张履祥本人倡导“尊朱辟王”思想具有开风气之先外，鲜有创新性，再加上他们多为民间底层人物，因此张履祥逝世后，其弟子的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更缺乏影响力。

张履祥卒后三年，即康熙十六年（1677年），陈确亦卒。陈确鲜有弟子，而杨园弟子影响又不大，因此敢山学术在经历转型分化后，最后由黄宗羲及其弟子发扬光大，并赋予新的学术内涵和特质，形成浙东学派的鼎盛之势。

此外，清初浙东学派尚有姚江书院弟子群。人清后的姚江书院先后由沈国模、史孝咸、韩孔当、俞长民和史标主持院事。姚江书院讲学依循王学后学陈规，缺乏创新性，而主事者又无突出的学术成果，因此清初姚江书院虽有社会影响，却无学术成就。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即黄宗羲逝世前一年，黄氏弟子邵廷采应余姚知县韦钟藻之请，主讲姚江书院，邵氏条次《姚江书院训约》，立教一本刘宗周，自此姚江之旨与证人书院无二，浙东学派都归于梨洲门下。

## 二、繁荣兴盛：康雍乾时期的浙东学派

清代浙东学派的繁荣兴盛期跨越康雍乾三朝，持续时间最长。此期自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雨上讲学始，至嘉庆六年（1801年）章学诚逝世止。繁盛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黄宗羲与其及门弟子的活动期，集中在康雍两朝，后一阶段则是黄宗羲私淑弟子全祖望与邵廷采私淑弟子邵晋涵和章学诚的活动期，集中在乾隆朝。

先看前一阶段的浙东学派活动。这一时期的学派活动是以黄宗羲为主线，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逝世为节点，此前黄宗羲通过讲学著述促进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复兴和繁荣，此后黄宗羲弟子以纪念黄宗羲为纽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浙东学派。黄宗羲的讲学活动先是在宁波、绍兴两地开展，后又到海昌进行。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万言与陈锡、陈赤衷、范光阳等26人往余姚向黄宗羲请业，“请道论心，极一时师友之盛”，信宿而返。同年五月，黄宗羲亲至宁波，讲授敲山之学，授以《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原旨》、《证学杂解》和《人谱》等鼓山诸书。次年，雨上讲会正式命名为“甬上证人书院”，以示承续刘宗周越中“证人书院”之旨。黄宗羲的甬上讲学活动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结束，长达9年之久。雨上讲学培养了大批弟子，据金林祥统计有66人，除去私淑弟子全祖望和董允璵外，实为64人。其中有不少是甬上望族子弟，如万氏、董氏、张氏、郑氏、李氏、高氏等。康熙六年九月，黄宗羲还与敲山弟子姜希辙、张应鳌等继承刘宗周遗志，在绍兴重开证人书院讲会，毛先舒、邵廷采与学焉。然而由于“越中类不悦学，所见不能出于训话场屋”，其讲学更加关乎科考功利目的，与黄宗羲传承敢山学术相距甚远，因此黄宗羲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在雨上讲学上。所以黄宗羲的绍兴弟子只有邵廷采1人。不过，黄宗羲此后仍多次参与绍兴证人书院讲会。除了宁、绍两地外，黄宗羲还到海昌（海宁）讲学。康熙十三年（1674年），知县许三礼在海宁建正学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康熙十五年（1676年），许三礼又建海昌讲院，聘黄宗羲主讲，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许三礼离开海昌，黄宗羲主讲海昌讲院达5年之久。其海昌弟子多达巧人，涉及到海宁查氏、陈氏、杨氏和朱氏等四个名门望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黄宗羲还应邀会讲于姚江书院。黄宗羲的著述活动主要集中在讲学之后。其《明儒学案》、《宋元儒学案》、《明文海》、《南雷文定》等重要著作均是此期所著述和编纂。黄宗羲的家学也异常兴盛，其弟黄宗炎和黄宗会、子黄百家都是清代浙东学派的著名学者。黄宗羲的讲学、著述和家学极大地推进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兴盛和发展。黄宗羲卒后第二年，即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黄门弟子27人集于万言家中，私谥黄宗羲为“文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应学使张希良之请，黄宗羲入祀府库。雍正元年（1723年），郑性建二老阁，纪念郑性之祖、郑梁之父郑漆和黄宗羲二人，并收藏郑氏先代遗书两万余卷和黄宗羲续钞堂三万卷书。二老阁也成为黄门弟子及其后学聚集、瞻仰和讲学的重要场所。黄宗羲卒后三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万斯同应郑梁之请，曾于甬上讲学三个月，传梨洲之学。

后一阶段浙东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全祖望、邵晋涵和章学诚。全祖望的学术活动始于雍正朝后期，但凸显在乾隆朝前二十年。全祖望“性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节诸人，祖望益广修扮社掌故、桑海遗闻以益之，详尽而核实，可当续史。宗羲《宋元学案》甫创草莫，祖望博采诸书为之补辑，编成百卷”，是为黄氏私淑弟子。邵晋涵和章学诚是邵廷采私淑弟子。两人生卒年限基本上与乾隆朝相一致，当全祖望逝世后，他们就成了乾隆中后期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邵晋涵是邵廷采从孙，曾充四库馆纂修官，学术贯通经史。章学诚与邵晋涵相为友从，极为推崇其族祖邵廷采，“谓五百年来罕见”。章学诚以史学见长，著有《文史通义》，提出“六经皆史”著名观点。乾隆朝的浙东人物除了黄宗羲私淑和再传弟子外，尚有天台齐召南、齐世南兄弟及族人齐周华，以及瑞安孙希旦。他们虽不是浙东学派人物，但对于浙东学派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孙希旦，著有《礼记集解》，又十分推崇宋元永嘉学术，对于同光时期瑞安永嘉学术复兴具有重要导引作用。

此期浙东学派在学术研究上有着极为鲜明特色和突出成就。黄宗羲作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其学术思想虽然渊源于刘宗周，但对敢山学术多有修正，强调“以六经为根抵”、“兼

令读史”，重视学术的经世致用性。这不但促进了浙东学派的明清转型，而且极大地廓大了其规模和内涵。首先，黄宗羲非常重视六经根抵的经学治习。早在甫上证人书院讲学时，他不但讲习鼓山之学，而且自讲习次年，即康熙七年起，就开始讲授经学，先后讲授了《易》、《诗》、《书》、《礼记》、《周礼》、《春秋》等经学著作。因此梨洲弟子普遍重视经学治习，有深厚的经学根抵。其中治经为主者以万斯大为突出代表。其次，黄宗羲特别强调治史之功，认为“不为迂儒，必兼读史”。黄宗羲治史“尤留意于当代文献，及乡邦掌故”。史学是梨洲学术群体最突出的成就，以致后人常把此期的浙东学派称为浙东史学派。其三，黄宗羲以独特的史学观重视文学的文化功能。他不仅在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基础上提出“诗之与史，相为表里”的学术观念，更是强调“史亡而后诗作”。认为国破人亡、史学无复存在的时候，诗歌具有其独特的史学价值。这不单纯体现了诗歌对于史料学的价值，更凸显了诗歌具有寄托故国之思、节士之义的“精神史”的独特文化价值。所以梨洲学术群体以文学见称而兼善经史者特别多。其四，黄宗羲对于历学和算学也很重视，撰写过《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勾股图说》、《测圆要义》等许多历算学著作，惜大多已亡佚。重视历算学是基于经世致用思想，以辟明末高谈心性之空疏。其弟子陈舒、子黄百家、七世孙黄炳重皆是历算学的主要传人。总之，梨洲学术群体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强调经学根抵，凸显史学特色，重视学术与事功的合一性，取得了极为突出的学术成就。

### 三、中衰重塑：嘉道时期的浙东学派

嘉庆道光两朝是清代浙东学派的中衰重塑时期。所谓中衰是指此期的梨洲学术传人无论是声名还是成就都远不如其繁盛期的学术大家，其学术发展走向了衰落；所谓重塑是指此期的浙东学人近借乾嘉学术资源，远绍宋元浙东学术传统，开始赋予清代浙东学派以新的文化内涵和学术特质。

嘉庆六年（1801年）是清代浙东学派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此年十一月，章学诚逝世，由此标志着具有梨洲学术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此后，梨洲学术传人有全祖望私淑弟子王梓材、再传弟子蒋学铺、黄定文和郑勋，邵晋涵弟子孙尔准、朱锡庚、章宗源等。王梓材为鄞县人，幼承家学，又私淑于全祖望，肆力于经，融会汉、宋，尤究心音韵及六书之学。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冯云壕受督学何凌汉委托，补遗《宋元学案》，成《宋元学案补遗》100卷。蒋学铺为全祖望表弟暨入室弟子。《清史稿》曰：“从祖望得闻黄、万学派，学铺尤得史学之传。”亦通于经，著有《三礼补笺》，“其立说不拘宋，亦不媚汉，将成一家言，为学官式”。黄定文为定海人，从董秉纯、卢镐、蒋学铺学，得全祖望之传，慨然有经世之志。郑勋为慈溪人，早年师事蒋学铺，习《毛诗》、《春秋》，得全祖望之学风。其高祖为郑梁、曾祖为郑性。孙尔准为江苏无锡人，曾奉命协纂《全唐文》，师事邵晋涵，学问淹贯，善诗词，兼工书法。朱锡庚为朱琦之子，四岁从父习《尔雅》，后从王念孙受六书之学，又师事于邵晋涵，专攻《左氏春秋》。极为推崇章学诚之史学，认为章氏史学与孔广森的春秋学、王念孙的训诂学为清代学术“三绝”。章宗源为会稽人，是清代有数之辑佚家，师事邵晋涵，所辑甚夥，惜未刊刻。概而言之，此期的梨洲学术传人虽取得一定学术成就，但处于衰落状态，并且再也未培养出学术传人，学术研究表现出汉、宋融会的特点。

当梨洲学术传承走向衰落时，阮元对浙东学派的重塑和复兴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月，阮元任浙江学政；中间短暂离职后，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又授浙江巡抚。是年五月，阮元于西湖之滨建立了话经精舍，奉许慎、郑玄木主于舍中。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聘请孙星衍和王昶主讲精舍。话经精舍对于清代中后期的江浙人才培养以及浙东学派的学术重塑起了重要作用。话经精舍刚成立，临海洪颐煊与弟震煊就为阮元以“能经之士”招人，肄业其舍，深受主讲孙星衍赏识。洪颐煊先后长时间游于孙星衍和阮元幕府中，洪震煊亦为阮元所称颂。与洪氏兄弟同时肄业话经精舍的还有临海金鹗。金鹗“邃于《三礼》之学，披郑导家，实事求是”，著有《求古录礼说》等著作，“莫不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辅翼群经”。由此可见，阮元对于浙东新学人的培养已由经史义理转向了汉学训诂，重塑了浙东学术的文化内涵和学术特质。特别是自同治七年（1868年）起，俞樾于重建话经精舍主讲逾三十年，其讲习亦“推文达（阮元）之意，通经必从训诂始”，“课士一依阮元成法”，充分体现了阮元对于浙江学术的深远影响。

稍早于洪氏兄弟和金鹗而受到阮元器重的浙东学人还有青田端木国瑚。嘉庆元年（1796年），端木国瑚受到阮元赏识，应邀赴杭，就读于敷文书院，成为阮元的人室弟子。阮元恒夸示人曰：“此青田一鹤也！”端木国瑚著有《周易指》、《周易葬说》、《地理元文注》等著作。端木国瑚与道光年间瑞安孙衣言、孙锵鸣、黄体正、德清俞鸿渐都有着渊源深厚的师友关

系。端木国瑚有弟子曹应枢，而曹应枢弟子有孙衣言、孙锵鸣和黄体正等人。曹应枢曾主讲瑞安玉尺书院，孙氏和黄氏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和十四年（1834年）院先后两次肄业于该书院。端木国瑚还与俞樾父亲俞鸿渐相从甚好，道光十五年（1835年）冬，端木国瑚曾为俞鸿渐所赁居屋题写“印雪轩”。此时俞抛正随父就读。此后，俞鸿渐所撰著述皆题以“印雪轩”之名。因此，通过阮元和端木国瑚的学脉传承以及相关家学和师友关系，可以看到以俞樾、孙治让为代表的晚清浙江学术与乾嘉学术的渊源关系。此外，阮元弟子金鹗与黄式三的关系也非常友好，他们都重视礼学治习。同时金鹗还与陈负相从甚好，“交相推服无异词”，而陈炎曾为俞樾所师从。章太炎说：“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所以晚清浙东学术受乾嘉学术影响甚深。

其实，早在乾隆朝，邵晋涵和章学诚就与乾嘉学人朱摘有着密切交往。乾隆三十年（1765年），章学诚至京师应顺天乡试落第，经沈业富介绍，学文于朱绮，并寄居其家，成为朱氏入室弟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朱绮充会试同考官，邵晋涵礼部会试第一。同年十月，朱摘为安徽学政，邵晋涵和章学诚等人随朱绮离京，同至安徽太平使院。这种密切交往关系，以致时人对邵晋涵的学术认识都发生了偏差。阮元即指出：“先生（指邵晋涵）本得甫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深，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由此可知，乾嘉学术兴起后，对浙东学派一直有着影响，只不过其程度经历过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也正是乾嘉学术这种不断深化介入，使得清代浙东学派在走向中衰时能够凭借其学术资源而进行重塑，从而再次达到学术复兴。

阮元虽为乾嘉学术的殿军，却不固守汉学话训，而能融会汉、宋。其力倡“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思想观念较为开放，具有包容性，所以他曾问学于浙东学人邵晋涵。其自述曰：“岁丙午（乾隆五十一年），元初入京师。时前辈为学者，有高邮王怀祖（王念孙），兴化任子田（任大椿），暨先生（邵晋涵）而三。元咸随事请问，捧手有所授焉。”同时，阮元与章学诚、邵晋涵次子邵秉华的关系也非常友好。这样，由邵晋涵到阮元，再到端木国瑚、曹应枢和金鹗，连接到瑞安孙衣言家族和黄体正家族、德清俞鸿渐家族、定海黄式三家族，阮元由此成为清代浙东学派传承中重要一环。同时，晚清定海黄式三家族还与梨洲学脉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黄式三族叔父黄定文是全祖望的再传弟子，黄式三另一族叔父黄定齐曾长期坐于其兄黄定文幕中。两人对黄式三的学问多有勉励和奖掖，黄式三则分别为两人分别作有《族谱东井公传》和《族蒙庄府君谱传》。因此，通过“邵晋涵—阮元—端木国瑚”、“全祖望—蒋学塘等—黄定文”的传承关系可知，晚清浙东学术虽然受乾嘉学术影响深远，但在学脉传承上仍然可以承续到梨洲学脉上来。以此观之，浙东学派在整个清代其实是有一以贯之的学脉传承关系，并未完全中断，只不过中衰重塑时期表现得较为隐晦而已，并且前后的学术内涵和特质发生了较大变化。

清代中后期浙东学派能够由中衰经重塑走向复兴，除了嫁借乾嘉学术之外，还得益于宋元浙东本身的学术资源。如黄式三《读金仁山（文集）》、《年谱》就把金履祥的著述奉为圭臬，十分重视金华四先生学术思想。瑞安孙衣言更是“以振兴永嘉学派自任。故于乡先哲之遗著，搜集传播不遗余力”，馨多方搜集永嘉遗籍，编有《永嘉丛书》等。又“尝编《永嘉学案》以见派别之正。又曰：‘欲救今汉学、宋学之弊者，其永嘉乎！’”。

总之，嘉道时期的浙东学派，就梨洲学脉而言是走向了衰落，但通过近借乾嘉学术，远绍宋元浙东学术，又得到了重塑和转型，学术特点则由经史义理转向通经训诂，并由陆王学统转向程朱学统。

## 四、多元复兴：咸同光宣时期的浙东学派

咸同光宣四朝是清代浙东学派多元复兴时期。所谓多元复兴是指学脉传承呈现多元化，并且不同学脉之间互有密切的关联性。具体而言，这种多元复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家族；二是瑞安孙衣言、孙锵鸣、孙治让等“三孙”，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等“三黄”，宋恕、陈虫L、陈献哀等“三杰”；三是德清俞抛及其弟子；四是绍兴宗樱辰、李慈铭、平步青等学人群。其中前三者是复兴的主体，以俞抛、黄以周和孙治让为典型代表，并以俞樾为中心形成网状关联结构；后者则是复兴的正体，更得敢山、梨洲之传。

晚清浙东学派复兴最早体现在定海黄氏学术家族的兴起。由于年岁较长和受家学熏陶，早在道光中后期，黄式三就已经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而此时年岁稍晚于其半辈的孙衣言、孙锵鸣和俞樾尚忙于求学和科考。黄式三“于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

》，而尤长《三礼》”，其治经论礼谨守郑玄之学。黄式三之子黄以周幼承庭训，潜研儒典，以传经明道自任，“于《易》、《诗》、《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礼》尤为宗主”。⑧光绪十年（1884年），黄以周主讲江阴南著书院，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以周在南著书院讲学主“博文约礼、实事求是”，培养了大批人才。

瑞安是晚清浙东学派复兴最重要的地区，涌现出“三孙”、“三黄”和“三杰”等学术家族或群体。其中，孙氏家族是瑞安学术的中心，成就最突出，影响也最大。

先看“三孙”学术家族。孙衣言“承其乡先正遗绪，大张永嘉经制之学”，其“平日论学，宗主宋儒。宋儒之中，又深服膺胡安定经义、治事、分斋设教之旨”。曾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孙锵鸣为孙衣言弟，其科甲早达，而仕宦始终翰苑，经学、子学兼治，义理、训诂并重。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金陵钟山书院、上海龙门书院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分校礼闈，得门生李鸿章和沈葆楨。孙治让为孙衣言子，承过庭之训，于经学、子学、小学等皆有成就。其《周礼正义》被梁启超称作是“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章太炎则赞其为“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

次看“三黄”学术家族。黄体芳，生平敦尚风节，爱才疾恶，刚直敢言，抨击时政，纠劾官吏，是光绪朝一位铮铮谏臣。光绪八年（1882年），黄体芳连任江苏学政，于江阴筹建江阴经古书院，次年落成，命名为南著书院。书院“规仿话经精舍例……论者咸谓漱兰力扶实学，一如阮文达之造我浙士云”经其聘请的山长先后有张文虎、黄以周二。尤以黄以周的主讲，影响巨大。黄绍箕为黄体芳之子，主张维新强国，提倡创办新学，重视教育，曾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亲订学制等各项章程。

黄绍箕为黄体芳之侄，其思想亦倾向于维新变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黄体芳、黄绍箕加入强学会，返京后又与绍箕联名上疏，痛陈外事丧权，建议改革。三黄皆师从孙氏，黄体芳师从孙衣言，黄绍箕师从孙锵鸣，黄绍箕则同时师事孙衣言、孙锵鸣兄弟。此外，黄体芳之兄黄体正还曾与孙氏兄弟同师事于青田端木国瑚，因此两家关系非常亲密。

再看“三杰”学术群体。宋恕、陈虫L、陈献哀三人被称为“东匪三杰”或“浙东三杰”。三人相从过甚，曾于光绪八年（1882年）与他人结求志学社，后又同倡维新思想。但三人学术思想有较大差异，宋恕其学“近王符、仲长统、徐翰”，陈虫L“与苏轼、陈亮为近”，陈献哀“于学虽无所不窥，然亦宿于性理文章经制，治性理宗陆九渊、王守仁”。咖“三杰”中，宋恕师事孙衣言，为孙锵鸣女婿；陈虫L、陈献哀与孙氏家族也多有交往，后因学术观念不同而有所矛盾，经宋恕调解而和好。宋恕和陈献哀都重视讲学授业，弟子众多。

俞樾是晚清经学大师，“训诂主汉学，义理主宋学，教弟子以通经致用，蔚为东南大师。”哪其汉学宗高邮王念孙，宋学则受座师曾国藩影响。同时，俞樾还曾问学于宋翔凤，也受今文学影响，“治《春秋》颇右《公羊氏》”。俞樾除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外，还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先后主讲过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尤其是自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主讲杭州话经精舍长达31年之久，“课士一依阮元成法”。

俞樾是晚清浙东学术网络的中心，紧密地联系着定海黄氏家族和瑞安孙氏家族。同治七年（1868年），俞樾刚到杭州话经精舍，黄以周便呈《礼书通话》为塾执弟子礼。其（（上俞荫甫先生书》曰：“所呈《礼经通诂》（即（L书通话））两册，凯求指示纸繆，稗得改正。果蒙惠教，周将执弟子礼，奉全书以拜门下。”俞樾与瑞安孙氏家族更是颇有渊源。他与孙衣言交往久远，两人三为同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同登进士第。孙衣言之子孙治让则私淑俞秘，其为俞氏所撰《哀世丈俞曲园》挽联曰：“册年私淑，愧未列赵商、张逸之班。”孙锵鸣女婿、“三杰”之一宋恕则是俞樾话经精舍的人室弟子。

以上三大学术群体是晚清浙东学派复兴的主体，由于近接乾嘉学术，远绍宋元浙东学术，因此有着与康雍乾浙东学派不一样的学术内涵和特质。一是训诂通经，汉、宋兼采。晚清浙东学派学者大都重训诂解经，但他们又不囿于汉学训诂，而能兼采汉、宋。如黄以周《南著书院立主义》即主张同时重视郑玄和朱熹的解经方法。二是礼学研究成就突出且颇具特色。黄以周提出：“礼也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极大地凸显了礼在经学中的地位。定海黄氏家族即以礼学为其家学特色，而黄以周《礼书通故》尤为人所称道。瑞安孙治让著有《周礼正义》和《周礼政要》等礼学著作。三是子学研究成果突出。俞樾《诸子平议》、孙治让《墨子间话》、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等都是晚清诸子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果。

虽然晚清浙东学派更多地嫁接了乾嘉学术内质，以训诂解经学、子学为主要特征，但作为

整个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梨洲学脉仍有一些联系和承续。如孙锵鸣十分推崇黄宗羲，“最慕余姚，曾求《待访录》槧本不可得，则多方转假，手自精写，置于家塾，《待访录》人温自此始”。具体而言，这种学术上的承续和贯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晚清浙东学派也有着敏锐而深邃的史学意识和观念。如孙衣言虽服膺胡绳之“经义”、“治事”两端，但同时也重视史学之功。俞樾则提出“史犹经”之观念，陈献章更是高扬“经制则自治史始”。其二，晚清浙东学派也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目的，重视经世事功。如孙治让“以通经致用为急”，因此撰《周礼正义》；又著《周礼政要》，“裙裾其与西政合者甄辑之，以备裁择”。此外，孙治让还曾在乡里大兴地方教育，与黄绍箕、黄绍第、宋恕等人在瑞安创办算学书院、化学学堂、蚕学馆、博物讲习所、天算学社、农学会等，这些都体现了浙东学派经世事功的突出特点。不过，由于晚清浙东学人通经训诂的突出成就，人们只关注到他们与乾嘉学术的联系，被认为是清代汉学最后的阵地，却忽略了与梨洲学术和南宋浙东学术的关联性。

如果从学术传承的正统性来说，上述三大学术群体虽是晚清浙东学派的主体，却不是正体，而此期更得敢山、梨洲正传者是宗樱辰、李慈铭和平步青等绍兴学人群体。宗樱辰“潜心理学，遍览诸儒书，其书以和同朱、陆为宗”，“主敢山书院，发明刘宗周慎独宗旨，救王学流弊。又以尹和靖、朱子先后至越，特于家塾为四贤义学，躬亲指授，成就者众”。李慈铭为宗樱辰弟子，少时师事宗樱辰，服膺宋儒，但后来也受到乾嘉学术影响，“洞明《三礼》，尤精小学。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说经确守乾、嘉诸老家法，于史学致力最深”。其“自谓于经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夹、诗余、传奇，无不涉猎而杭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平步青与李慈铭相交甚洽，“能为文章，长于乙部，其治史学，则绍述浙东”。他以传承浙东学术自任，其曰：“环顾宇内，深宁（王应麟）、东发（戴震）之学，绍述者谁？而浙东南雷（黄宗羲）、石园（万斯同）、思复（邵廷采）、南江（邵晋涵）、实斋（章学诚）诸家，渊源自具，津逮者亦图然，每读先生（全祖望）集，辄抱时过后学之恨也。”虽得正传，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都远不如前面三大学术群体。

## 五、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地位

清代浙东学派是地域特色鲜明而又学术影响广泛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具有十分突出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第一，清代浙东学派承续了宋明浙东学派的传承和发展，使得浙东学派自南宋创派以来，具有学脉延续和学统传承的学术贯通性，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地域色彩凸显、辐射范围极广、学术影响极大的重要学术流派。

从学脉延续来看，清代浙东学派承接明代敢山学派和姚江书院学派而来，经转型分化后又归于梨洲门下，通过黄宗羲授徒讲学而达到繁荣鼎盛，至嘉道时期，梨洲学脉一方面走向中衰，另一方面又经嫁接乾嘉学术和远绍宋元浙东学术而得到重生和重塑，进而进入到晚清的多元复兴局面。其学脉延续虽有中衰隐晦之时，却始终不绝如线，绵延而下。

从学统传承来看，清代浙东学派前期主要接续了陆王心学学统，后期虽然以汉学为主体特色，但接续了程朱理学学统。清代浙东学派学统先陆王后程朱，既是清代学术思潮的时代体现，同时也是浙东学派学统多元化的结果。宋代浙东学派最早是永嘉、金华两支，“这两支中人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继承程氏的学说”。与此同时，明州袁燮、杨简等甫上四先生传江西陆氏心学。此后，朱子学又广播浙东，金华何基等北山四先生为一支，慈溪黄震为一支。此外，尚有E县史蒙卿，永嘉陈植、叶味道等，皆传朱子学。多元化的学统使得浙东学派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地自我调适学术传承。清代黄宗羲以经史之学修正王学，具有返本归源的意义。四明心学创传之初就充分吸收到金华吕氏史学，吕祖谦之弟吕祖俭于明州为官六年，经常于四明讲学中传播史学，使四明心学重视文献，究性命于史学。

从学术特质来看，清代浙东学派既传承了宋明浙东学派的一些特质，同时又有自身的学术特征。其具体表现前面各阶段已有论述，虽然鼎盛期和复兴期有着经史义理和经子训诂的不同侧重，但整体上仍有一以贯通的学术特质，即重视学术的史鉴意识和经世事功，以及彰显乡邦节义和传承乡邦文化。

第二，清代浙东学派是清代学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清代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浙东学派是清代学术的时代引领者和担当者。清代前期，敢山三大弟子张履祥、陈确和黄宗羲为清代学术的时代转型和发展起了重要引领和奠基作用。张履祥开启清代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被梁启超誉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陈确以文献考辨方法来探讨义理之学，对于清代考证学风的出现也具有启蒙作用。黄宗羲更是在多个领域对清代学术发展具有开创作用。乾嘉学术衰落之后，清代整体学术也随之进入中衰状态。所以，晚清浙东学派的多元复兴，不仅体现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复兴，同时也体现了清代学术的复兴。

浙东学派还不断地拓展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新视阈和新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学术的繁荣和深化。这具体表现在清代浙东学派所涉及的学术领域从经学延伸到史学，再拓展到子学和文学，其学术领域极为广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突出特点。就其经学而言，以礼学成就最为突出。而史学是浙东学派最突出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重视当代史、地方史、学术史以及史学理论等方面，并且注重史学的主体气节和家国意识阐发，这不仅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弥补了清代学术总体上史学弱化的缺陷。子学被认为是六经之流裔，不为经学家们所重视。晚清子学得到勃兴，浙东学人贡献突出。文学更不被儒学所重视，理学家甚至认为作文害道，但清代浙东学派却很重视文学，梨洲学人群长于诗文固不待说，晚清涌现一批小说评论者，如俞樾、李慈铭、平步青、孙宝煊等人，都是浙东学派中人。

第三，浙东学派对中国学术由“旧”而“新”的现代转型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晚清浙东学人为中国学术现代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材，另一方面表现在晚清浙东学人为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人材培养来看，晚清浙东学人培养出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人材。特别是俞樾和黄以周分别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一年和南菁书院十五年，许多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学术贡献来看，晚清浙东学人推动了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特别是为学术的现代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贡献突出。中国学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首先必须破除经学的学术权威性和中心地位。浙东学派由经学而史学、再到子学和文学的学术拓新，一方面固然拓展了清代学术的新视阈和新领域，丰富了其学术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对经学的学术权威性和中心地位潜藏着巨大破坏力。章太炎正是沿袭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口号来解构和消解经学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其曰：“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经学的权威性和中心地位被摧毁，其他学术的地位则得到提升，由此推动了现代学术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章太炎及其弟子在这方面贡献尤多，使得史学、语言文字学和文学作为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得到初步形成。

总之，清代浙东学派传承了宋明浙东学派，繁荣了清代学术发展，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